

《艾思奇全书》中 《抗战文艺的动向》一文若干史实考辨

姚宏志

1938年,艾思奇在延安撰写了《抗战文艺的动向》(以下简称“《抗》”)一文,总结了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文艺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,同时对今后文艺的发展趋向作出了展望。该文是抗日战争时期文艺界有关“民族形式”问题讨论最早的文献之一。2006年,由艾思奇著作编委会编辑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卷本《艾思奇全书》,“比较严格地按照发表或写作的时间顺序”^①进行编排,《抗》文被收录在其中第2卷。但是,笔者近期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,收录在《艾思奇全书》中的《抗》文,存在着三处错误:一是将该文的写作时间弄错;二是将首刊该文的《文艺战线》创刊时间弄错;三是多出来三个莫名的标注数字。

一、《抗战文艺的动向》的成文时间

《艾思奇全书》所收录的《抗》文,将其成文时间醒目地标注为1938年2月。但是笔者在对《抗》文内容的详细阅读后认为,这个时间标注是错误的。因为《抗》文第一部分在回顾抗战以来文艺界所取得的成果时,列举了大量史实,其中许多史实不是发生在1938年2月之前,而是之后。例如,文章指出,文艺界自抗战以来已经形成了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,“这不单只在形式上表现于我们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,不单只表现在这个协会的一个机关刊物《抗战文艺》所表现着的全国团结的精神”。^②作者在这里提到了两个历史事实:一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(简称“文协”)的成立;二是“文协”的机关刊物《抗战文艺》的创刊。通过查阅资料后发现,“文协”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,是抗战时期中国文艺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;《抗战文艺》于1938年5月4日在汉口创刊,刊物编委会由各方面的代表作家共33人组成。从上述两大史实的发生时间可以看出,《抗》文的写作时间只能是在这些史实发生之后,而不可能在此之前。其实在《抗》文中,像这样的历史事实还有一些。例如,作者在文中提到的两大期刊《战地》和《文艺阵地》(均为半月刊),也是在1938年2月之后才创刊。前者于1938年3月20日在上海创刊,编辑人为丁玲、舒群;后者于1938年4月16日在广州创刊,编辑人为茅盾。

在排除了1938年2月《抗》文写作时间的可能性之后,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具体成文时间。笔

^① 《艾思奇全书》第1卷,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,第3页。

^② 《艾思奇全书》第2卷,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,第465—466页。

者在细读《抗》文后发现,文中出现两处如下表述:一是“抗战到现在才不过17个月的时光”;二是“17个月来文艺上各方面的活动在我们的面前提出了许多问题来”。^①上述两处关键性表述,均提到“17个月”的精确时间概念。换言之,如果确定了作者时间计算上的起点月份,加上17个月,即是《抗》文的确切写作时间。那么,《抗》文以什么时间、什么标志性事件作为“17个月来”的时间计算起点呢?通过对上下文的阅读可知,这一标志性事件是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。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起,加上17个月,进一步推导出《抗》文的写作时间为1938年12月,比原先标注的时间整整延后了10个月。

当然,有人会提出疑问,《抗》文在计算“17个月”的时间起点上是否存在着如下可能:即不是1937年7月而是1936年9月(以1938年2月为基点,向前推17个月)呢?这种疑问似乎合理,实际上并不成立。且不说1936年9月国内并没有发生像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这样重大的标志性历史事件,并以此作为划分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转折点,仅从艾思奇同期发表的《敌机轰炸延安》一文中有关“17个月”的表述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。该文劈头就写道:“在抗战的第17个月,在广州、武汉相继失陷以后不久,凶横残暴的日寇于1938年11月20、21日两次用飞机来轰炸了延安……17个月来,不但我一切战区沦陷区域受尽奸杀焚掳的苦痛,而战区以外的我一切主要城市,也没有不遭受轰炸的灾祸。”^②这里同样出现了“17个月”的一致性表述,可知《抗》与《敌机轰炸延安》两文的成文时间均在同一月份。现在已经明确的是,《敌机轰炸延安》写于1938年12月,因此,《抗》文成文时间毫无疑问应当同样在1938年12月。

二、《文艺战线》的创刊时间

既然《抗》文的写作时间不是1938年2月,而是同年12月,那么,《艾思奇全书》将原载此文的期刊——《文艺战线》的创刊时间标注为1938年2月16日,显然也是错误的。《文艺战线》的实际创刊时间只能是在《抗》文成文时间之后的1939年。

笔者通过查阅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期刊后发现,署名《文艺战线》的期刊曾先后出现过4种。一是1931年9月创刊于北平的《文艺战线》周刊,后改为半月刊,编辑人为张少峰。1937年7月,该刊出至第5卷第15期后停刊,共出版184期。二是1937年11月22日创刊于武昌的《文艺战线》旬刊。该刊由《奔涛》和《文艺》期刊合并而成,编辑人为胡绍轩。1938年3月26日,该刊出至第2卷第1期后停刊,共出版9期。三是1939年2月创刊于广东汕头的《文艺战线》月刊,由广州文艺通讯员总站汕头支站编辑出版。1939年4月1日,该刊出至第2期后停刊,共出版2期。四是1939年2月16日创刊于延安的《文艺战线》月刊。该刊是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”的机关刊物之一,周扬任主编。刊物在延安编辑,由生活书店在桂林出版,主要面向国统区发行。1940年2月16日,该刊出至第1卷第6期后停刊,共出版6期。艾思奇在1938年12月撰写的《抗》文,正是发表在1939年2月16日创刊于延安的《文艺战线》第1卷第1期上。

这里的问题是:为什么创刊于1939年2月16日的《文艺战线》,竟被《艾思奇全书》的编者标注为1938年2月16日呢?两者在时间上相差了整整一年。笔者认为,这一错误的产生可能与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出版过的艾思奇论文集《论文化和艺术》有关。1981年,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从艾思奇的遗著中精选出30多篇文章,汇编成《论文化和艺术》一书,于1982年8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

^① 《艾思奇全书》第2卷,第468、476页。

^② 《艾思奇全书》第2卷,第537页。

正式出版。《抗》文也被收录其中。编者在文末加注了《抗》文的来源期刊及出版时间：“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，延安《文艺战线》杂志第一卷第一期。”^①这是一个错误的标注，把《文艺战线》的创刊时间由1939年2月16日写成了1938年2月16日。这一错误是由疏忽还是其他原因所引起，现在已经无从知晓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《艾思奇全书》在编辑《抗》文时，尽管知晓并明确指出该文曾被《论文化和艺术》收录过，但没有发现该书编辑上的错误，反而沿袭了这一错误。因此，笔者有理由认为，《艾思奇全书》在编辑《抗》文时，并未核对原文的最初出处及期刊出版时间，结果是以讹传讹，错错相袭。

三、多出来的三个莫名标注数字

《艾思奇全书》在编辑《抗》文时的再一个错误，是在文中三个专有词汇——“周作人”、“《未死的兵》”、“托尔斯泰”旁边分别多出三个标注数字——“①”“②”“③”。^②乍看之下，人们误以为《抗》文要为这三个词汇作注释，但翻遍《艾思奇全书》第2卷，也未找到与之相匹配的三条脚注或尾注。笔者又仔细查阅了《文艺战线》创刊号上的《抗》文，发现原文中并没有出现诸如①、②、③之类的标注数字，更没有相应的注释。

既如此，那么《艾思奇全书》中三个莫名其妙的数字从何而来呢？笔者再次查阅了《论文化和艺术》一书，发现该书在编辑《抗》文时，对上述三个专有词汇在文末分别作了注释，并在文中相应的地方标有①、②、③数字。该书编者在后记中特别指出：“为使读者阅读方便，我们参照有关资料，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注释。”^③这就是说，《论文化和艺术》在收录《抗》文时，实际上已经对原文进行了少量编辑，特别在文末添加了三条注释以及文中相应的三个标注数字。这些由编者后加的文字，虽然为读者阅读文献提供了便利，但终究不是原文的固有内容，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文献本身。因此，为了恢复原文的本来面貌，《艾思奇全书》在收录《抗》文时，虽然十分明智地删除了《论文化和艺术》中《抗》文末尾的三条注释，却十分醒目地将文中对应的①、②、③三个数字依旧保留着。这种编辑上的错误和尴尬实不应该。

为了帮助大家理解《抗》文，笔者将《论文化和艺术》一书为该文所作的三条注释照录如下：“①周作人(1885—1968)，浙江绍兴人。现代散文家。30年代和林语堂鼓吹‘闲适幽默’小品。抗战时期，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。②《未死的兵》，今译《活着的士兵》，日本现代作家石川达三著，描写日军侵华的诸般暴行，时人一般称之为反战小说。1938年3月，在日本《中央公论》发表的当天，即被禁止发行。③列甫·托尔斯泰(1828—1910)，伟大的俄国作家。著有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复活》等小说。他的作品广泛地描绘沙皇俄国的社会生活，深刻地反映出以宗法社会为基础的农民世界观的矛盾：一方面无情揭露沙皇制度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，一方面又宣传对恶的不抵抗，企图以‘自由平等’的小农社会来代替沙皇制度。”^④

〔作者姚宏志，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〕

（责任编辑：马晓娟）

① 艾思奇：《论文化和艺术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75页。

② 《艾思奇全书》第2卷，第468、471页。

③ 艾思奇：《论文化和艺术》，第281页。

④ 艾思奇：《论文化和艺术》，第76页。